

“破心中贼”的“忠义刀”

——评《水浒》中宋江形象的塑造

钟 平

忠义是《水浒》宣扬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基础。宋江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理想人物。宋江曾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忠义正是宋江反动思想的核心，宋江成了忠义的艺术标本。

《水浒》为什么不讲一个朝廷大臣(如包龙图或宿元景之类)，而要讲一个山上“盗魁”来集中鼓吹忠义呢？作者又是怎样在这个“盗魁”身上展现忠义的呢？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个忠义的特异标本呢？

作者为什么要“铸造”这把“忠义刀”

《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宋元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没落。地主阶级已“化为反动派”。封建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一年多似一年，一火(伙)强似一火”，使地主阶级陷入了全面的危机。统治者惊恐万状，认为农民起义是“腹心之疾深可忧”，国家“之所以亡，祸自此始”。怎么办？地主阶级各阶层的代表，纷纷献策，“讲求御盗之术”，以解脱灭顶之灾。

对“见在之盗”，统治者继承祖法，剿抚并用，相对地又以“抚”为主。这是因为后期地主阶级已渐趋没落，在起义军面前常常吃败仗的缘故。其中特别发明了“诱盗治盗”的毒计。欧阳修曾一再议建皇帝采取两条：一是拉过来。招募一伙中有能“杀贼脱身自归者”，一伙或诸伙“能谋杀”另一伙者，都给予重赏。二是打进去。“招募诸处下第举人及山林隐士、负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贼，算杀首领，及设计诱贼陷于可败之地者，重与酬奖。”出谋者说，即使不能收到直接杀灭的效果，也可使起义军“自相疑二”，“徒党难集”，无人“以为谋主”，便于各个“剪除”。此计一出，南宋、元、明、清等统治者多奉为“治盗”的诀窍，建立机构，设置官员，专干这罪恶勾当。

这种“诱盗治盗”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它虽能在一定时期内收到效果，却不能带来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统治者也认为这是“急则治标”的办法，只会“前贼虽灭，后贼更多”。怎样才能治本呢？这里也有两手：一手叫做“澄清吏治”，一手叫做“整肃民心”。这两手

中又是特别着重后一手。

所谓“澄清吏治”，即去贪邪，“用忠良，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这样做，也有一时一地的效果。但现实生活使农民懂得：清官、贪官，都是一个窝里的吃人狼，“不平人杀不平人，杀尽不平方太平！”于是统治者最着力施行的就莫过于“整肃民心”了。所谓“整肃民心”，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破心中贼”，使人民永远甘做奴才。朱熹说得很明白：治人之方，“不患法制之不胜，而患理义之不足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未以防之，……亦不必胜矣。”心杀重于身杀，这是理学的要害。宋明以来，理学成了笼罩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张毒网。“等贵贱，均贫富”，都被斥为邪恶的“人欲”，心中的“逆贼”，要一概加以“整肃”、“破灭”。朱注的“四书”、“五经”被官方定为人们言行的模式，强迫人信奉。什么《三字经》、《女儿经》、《神童诗》、《昔时贤文》、《二十四孝图》等等，都纷纷出笼了。它们如臭蛆，想拚命钻进人们脑子里去“存天理，灭人欲”，“致良知”。统治者的幻想是：“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这就是封建统治者自己想出的一整套“御盗之术”，也是他们自己找到的“救命灵丹”。

文艺服从政治。宋高宗曾特别喜欢讲述农民起义军归顺朝廷的故事。明太祖也极为称赞宣扬忠孝节义的《琵琶记》。他们的口号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就在这种背景下，《冯玉梅团圆》、《赵氏孤儿》、《琵琶记》、《忍字记》、《五伦全备记》等作品，都应运而生了。《水浒》就是这类作品的突出代表。施耐庵、罗贯中，亲身经历了元末农民大起义那“年荒世乱”的岁月，而对它怀有深刻的恐惧和仇恨，相传施耐庵又是叛徒张士诚的一个幕僚的好友，这样，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治盗”诀窍自然是心领神会了；宋江这个“不假称王”的“盗魁”也就成了他们鼓吹的、“最合时宜”的主人公了。

作者怎样“磨亮”这把“忠义刀”

《水浒》作者为了“磨亮”宋江这把“忠义刀”，在人物设置上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水浒》中大致写了四组矛盾、四个方面的人物来衬托、铺垫和美化宋江。第一，宋江与高俅等的矛盾；第二，宋江与晁盖、李逵等的矛盾；第三，宋江与辽国君臣的矛盾；第四，宋江与方腊等的矛盾。宋江始终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制约着它们的发展。而宋江用以制约这四组矛盾的“制高点”，就是忠君。头两组矛盾贯穿宋江形象塑造的始终。从表面看，第一组矛盾被当作了主要矛盾来渲染；实际上，第二、四组矛盾才是作者真正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在“磨亮”宋江这把“忠义刀”的锋刃上，第二组矛盾更是起着主要“磨刀石”的作用。

作者是怎样依靠这四组矛盾，一步步把宋江推向忠义的顶峰的呢？

第一步，以高俅的奸逼忠反和晁盖的主动造反来衬托宋江的至忠纯孝、逼而不反。作者一开头就写高俅怎样一上台就逼得林冲等反上梁山。接着写晁盖怎样主动聚义，智取生辰纲。在作了这样的铺垫后，宋江出场了。先是放晁盖、杀婆惜，被高俅控制的官府逼得四处逃难，终于被捕刺配江州。接着在去江州的路上被晁盖“劫夺”上山，坚决要他入伙。作者就把宋江

摆在这“两逼”之中，让他第一次来了个大亮相，宁愿做朝廷的囚徒，死也不当梁山的“贼徒”。在宋江看来，高俅虽奸，毕竟不反，做了他的囚徒还有期满出头之日；而晁盖“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这是“不忠不孝”、“万劫沉埋”的“迷天大罪”。所以，硬逼入伙，就要以死相拼了。

第二步，以高俅等的垄断朝政、不准归顺和李逵等的野性不驯、反对招安，来反衬宋江的改邪归正，百折不回。宋江不得已上了梁山，就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曲线尽忠。后来，时机成熟，就坚决争取招安，立意“改邪归正”。不管高俅等怎样阻拦，李逵等如何反对，宋江始终一片忠心，“物性莫夺”。例如，菊花会上的冲突。李逵始而大反招安，经宋江一吓一哭，终而完全驯服。作者这样写，一是以此表明宋江的忠义感人；二是借此引出宋江元夜的东京行来。作者是怀着满腔热情来描写宋江东京行的偷潜、问柳之事的。这里他特地设计了李逵大闹“御妓院”、大闹忠义堂、最后负荆请罪的情节，用李逵的见识浅薄、头脑简单，来反衬宋江政治眼光的卓绝，道德人品的高尚，以暗示读者千万别误会了他这样写的深意。又例如，第一次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外有高俅派人跟来破坏，内有李逵、阮小七等激烈反对。就在这种内外夹击的紧张关头，作者让宋江表演得淋漓尽致，又是横身抱住李逵，不让打钦差；又是横身拦挡众好汉，不让闹起来；又是亲自赶紧把陈太尉一伙护送下三关，再拜伏罪献计；又是马上回到忠义堂上责怪众人。为了尽忠王朝，真可谓手到、脚到、嘴到、心到了。

第三步，以辽国入侵和对宋江收买的失败来美化宋江的精忠报国、委曲求全。宋江“改邪归正”后，作者接着设置了征辽的情节。宋江是在什么情况下征辽的呢？高俅等征辽失败而又忌恨排挤宋江；众头领不满朝廷轻视、疑二而想重上梁山；辽国使臣又来晓以前途利害、许以厚禄高官进行劝降，连吴用也心动了。作者在作了这种渲染，让人觉得即使叛宋降辽也情有可原之后，再让他的理想人物排除一切险阻、诱惑，挺立起来：“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从而把这个农民革命的叛徒美化成民族革命的英雄，给这把“破心中贼”的“忠义刀”套上了一个爱国主义的迷人刀鞘。

第四步，以方腊等的“南面称君”、“暴虐百姓”来反衬宋江的“顺天护国”、“除暴安良”。征辽之后打方腊。在作者笔下，这时，一方面，方腊“改年建号，自霸称王”，“个个凶残淫暴”，百姓“四散逃亡”，高俅等官军无法抵敌；另一方面，高俅等蒙蔽皇帝，使宋江等有功“不能任用”，“倒受拘束”，气得李逵、三阮、吴用等就要在东京“杀将起来”。这对赵宋王朝来说，是双重危机。这时，又是宋江出来，一方面，喝骂李逵“反心兀自未除！”以死威胁住吴用、三阮等；另一方面，连夜化装入城，请求去打方腊，赶紧把就要在赵官家身边烧起来的一团大火，引去毁灭“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在作者笔下，宋江每到一处，总是“欢声雷动”。最后，“收军锣响千山震，得胜旗开十里红”。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被歌颂成了“除暴安良”的父母官。“忠义刀”上又给镀上了爱民的色彩。

第五步，以高俅毒害忠良的奸险和李逵死而不灭的反心，来反衬宋江屈死不负朝廷的“撼天大忠”。高俅害死宋江，宋江死而无怨；而且临死前还要为朝廷除掉李逵这颗“叛逆”的种子。这真是“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了。这样的结局，是作者精心设计的，把宋

江形象推上忠义顶峰的“绝招”。作者并不到此为止。还要让宋江的“忠魂”跑到宋徽宗梦里，诉说“衷曲”，求得封赏。这里，作者也始终没有忘记他塑造李逵形象的用意。就在宋江“忠魂”“朝见”之时，李逵这个“反心未除”的“逆鬼”却“抡起板斧，径奔上皇”。作者只是在完成了这一最后反衬，才唱着“万年青史播英雄”的诗句，结束了他对宋江的呕心沥血的颂歌。

我们要进一步指出，作者为了更好地使宋江这把“忠义刀”起到“治盗”的作用，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还要了更隐蔽的花招。

宋江与高俅的矛盾，本来“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作者却故意写成敌对的生死斗争，笼贯全书。这是为了诱骗读者把对整个地主阶级及其总头子皇帝的仇恨转移到高俅之类的贪官身上，以便让宋江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觉得宋江投降有理，做“强盗”也只能象宋江那样“唯剪婪墨，不戕善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去帮助统治者“澄清吏治”就行了。抛出高俅这个饵，正是为了把民心都钩在忠义的钩子上。

宋江与晁盖、李逵等的矛盾，明明是两个阶级的对抗矛盾，是投降派与革命派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作者却偏偏要用温情脉脉的“兄弟情义”的外衣把他们裹成“异姓一家”。宋江之义，事实上有三个意思：他对宋徽宗的“君臣之义”，是为主，是忠心不二；他对卢俊义等的“阶级之义”，是为辅，是真心相待；他对晁盖、李逵等的“兄弟之义”，是手段，是假心骗人。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忠。但表面上作者却着力渲染他的“兄弟之义”，而且让三者搅在一起，把宋江描写成为“义气真同骨肉”的“哥哥”。私放晁盖，就是作者在这个“哥哥”脸谱上涂上的最迷人的一笔。这是为什么呢？“统治经”有云：“既欲取之，必先予之”。适应为了征服。“同心协力，共聚大义”，是农民起义的一个特点。为了使宋江这个形象对于已经为“盗”和将要为“盗”的人，具有“足以悦其心”，最后“夺其性”的魅力，让他具有一种“江湖义气”和一副“哥哥”的脸谱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鲁迅曾说：“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有两种魂，官魂和匪魂。”《水浒》中的宋江就是一个寓“官魂”于“匪魂”中的角色。这是后世统治者的狡猾处，但也正是他们的没落处。“官魂”已不能正面征服“匪魂”了，以至只能披着“匪魂”的假皮来进行“偷袭”。然而，“官魂”和“匪魂”毕竟是不能合二而一的。宋江的形象，歪曲了现实，终究不过是忠义思想的单纯传声筒，是一个反现实主义的典型。

是拔掉这把“忠义刀”的时候了

《水浒》问世以后，虽有金圣叹者流的骂和砍，昏庸得看不出作者铸造这把刀子的“衷曲”，也有崇祯之类的禁和毁，虚弱得受不了一剂救命的补药；但地主阶级多数的精明者，从帝王将相到野老逸士，都是由衷欢迎的。作序、题跋、评点、刻印，不遗余力。他们赏识宋江“有侠客之风，而无暴客之恶”，正是他们“海盗”的教科书；他们盛赞宋江是“忠义之烈”的“大丈夫”，可作他们“百年树人”的黑样板。这把“忠义刀”在维护封建后世统治者的利益中是立了“血功”的。以后的帝修反也曾使用并还在使用这把“忠义刀”。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大搞“目的

在革心”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就表彰宋江“这种服从政府的忠诚和不畏死的人格，实就是现行新生活的精义。”解放后，林彪曾一再说，“忠孝节义”可以“用其内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礼，其重如山，其深如海”。“忠义刀”又要变成他们复辟的工具了。苏修叛徒集团也拚命吹捧宋江表现了“最优秀的人类品质——忠诚、真诚”、“兄弟义气”、“忠贞不渝”。这无非是想借宋江的“兄弟义气”去蒙骗他的“兄弟党”、“兄弟国家”，使他们能对莫斯科父王表现出“忠贞不渝”的“忠诚”来。

古今中外反动派都虔诚信奉宋江这把“忠义刀”，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水浒》是对于统治者“吃人经验”所作的一个艺术总结。宋江则是这一总结的集中体现。作为宋江反动思想核心的忠义，则是这经验的“精萃”。它反映了一切剥削阶级“治人要诀”的带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以兄弟平等的人性论来掩盖维护剥削压迫的反动用心。是剥削者反复炼制、用心麻痹被剥削者“造反神经”的妙药。

奇怪的倒是，我们队伍中的很多同志，竟也曾积极宣扬宋江。他们看到宋江反了贪官高俅，就认为他是反对封建社会；看到宋江与晁盖、李逵等哥弟称呼，就认为他是团结四方好汉的农民革命领袖。他们把禁、骂《水浒》的虚弱者和昏庸者，当成了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得出结论：“这难道还不应该肯定吗？”他们又把称赞宋江的某些精明的法家，看成仿佛已不是地主阶级的一员，得出结论：“这难道还应该否定吗？”这些同志“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们脑子充满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以至成了“忠义刀”下的俘虏。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是拔掉这把刀子的时候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对传统观念进行的一次大扫荡。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要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批判精神扩展到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去。“《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就深刻揭露了《水浒》的要害和宋江形象的实质，也清楚地指出了这把刀子在今日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和当前评论《水浒》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关系。我们要拔掉这把刀子，并不等于简单地表示对它的否定态度和憎恨感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进行历史的考察，科学的分析，深入的批判。它为什么产生？为什么鼓吹这样的思想？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形式？从这种分析批判中，汲取经验教训，启发我们去思考和认识：什么是投降派，什么是修正主义，怎样才能做一个不受蒙蔽、不被暗算的革命者，怎样才能具有对侵入我们头脑中的敌对思想的解毒力，等等，以便提高我们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战斗能力和策略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懂弄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这一无坚不摧、无隐不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我们很多同志，在作者狡猾地“铸造”的“忠义刀”面前，所以吃败仗，教训就在于没有做到这点。

可以预言，只要阶级还在，剥削者还在，宋江这把“忠义刀”就还会有人奉为法宝，不定何时凌空祭起。但我们坚信，在提高了觉悟的革命人民面前，将来的“祭刀人”必然比过去的“铸刀者”、“挥刀者”落得更可悲的下场！